



马汉“海权论”三部曲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年)

全译本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附 亚洲问题

Attached The Problem of Asia

【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著

李少彦 董绍峰 徐朵 等译



海洋出版社



马汉“海权论”三部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年)

全译本

附 亚洲问题

[美]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著

李少彦 董绍峰 徐 朵 等译



海洋出版社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附亚洲问题/
(美) 马汉 (Mahan, A. T.) 著；李少彦等译.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5

(马汉海权论三部曲)

书名原文：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 - 1783) : the problem of asia

ISBN 978 - 7 - 5027 - 8566 - 6

I. ①海…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制海权 - 研究 - 世界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3553 号

责任编辑：魏京华

责任印制：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100081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35. 25

字数：560 千字 定价：90.00 元

发行部：62132549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马汉“海权论”三部曲，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海军战略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被美国史学界称为“海权论的思想家”，“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少将于1890—1905年间出版的三部著作，分别名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以及《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

在“海权论”中，马汉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来探讨，他认为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并提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海权论思想是对历史的总结，也集中反映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对海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自马汉去世以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也验证了海权论的观点。

马汉的“海权论”甫一问世，就震动了世界。英国人为之倾倒，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噬马汉上校的书，并尝试将其牢记在心中。”马汉的著作很快被译成德、日、俄、意、瑞典等文，成为各国海军军官必读的理论书籍，在美洲、欧洲，甚至远东，对国民思想和国家的公共政策，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有关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更是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直至今日，“海权论”仍被认为是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名著之一。历史证明，世界上主要海洋强国都是在马汉海权论思想的直接影响下相继崛起并长期受益。

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在海洋权益日益引起各国高度重视的今天，海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从维护国家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与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角度，研读马汉的“海权论”，对于我们思考未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

在我国，虽然能够见到一些马汉海权著作的节译本和选编本，但是其海权思想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影响甚微，对于马汉海权理论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鉴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马汉这三部经典理论著作的全译本。为了能够忠实、准确、全面地表达马汉的海权思想，确保翻译质量，我们组织了具有相当专业理论和翻译水平的译者承担了图书的翻译工作，并请海洋战略领域的权威专家对译文进行了审定。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2C2-006）的大力支持下，经过长时间的多方努力，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马汉“海权论”全译本终于能够出版问世。我们衷心希望马汉这三部经典译著能够为社会公众全面了解马汉的海权思想、提高海洋意识提供知识储备，为专家学者研究海权思想、建立海洋强国理论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同时收入的马汉的另一著作《亚洲问题》，是马汉于1900年前后发表在《哈泼斯新月刊》和《北美评论》上文章的文集，包含第一篇《亚洲问题》、第二篇《亚洲的局势对世界政策的影响》和第三篇《德兰士瓦省争论的价值》。在马汉对当时亚洲局势展开论述的字里行间，其海权思想依然清晰可辨。考虑到其篇幅，将《亚洲问题》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合为一册出版，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马汉的海权论思想。

在编辑体例中，我们将原著索引中页码全部保留，并在译著正文相应标注出原著页码，以方便读者查考。

最后，我们愿引用王家俭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张其昀教授曾经指出：‘中国为大陆国，又为大海国，海权与陆权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海权强则国势盛，海权衰则国势衰，国史昭然，历历不爽。’甚盼公忠体国、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能够三复斯言，以史为鉴。”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以章节顺序排序）

翻译 李少彦 杨 静 王靖华 张志强 董绍峰
李军涛 陈 涛 谢 昂 麻晓晶 徐 朵
校对 李少彦 董绍峰
审定 李少彦 董绍峰
审读 曹卫东

《亚洲问题》（以章节顺序排序）

翻译 徐 朵 李 璟
校对 李 璟 徐 朵
审定 李少彦 董绍峰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 年)

李少彦 董绍峰 等译



序

本书所探讨的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以海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为关注焦点，考察欧洲通史以及美国通史。历史学家们普遍对海洋情况不太熟悉，对此既无特殊的兴趣，也无专门的知识。因此，海洋的力量对重大事件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受到忽略。与海权的一般趋势相比，这一点在特殊的事件上表现得尤为如此。利用和控制海洋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泛泛而论，不是件难事；但是，如果要在两者具体的交汇处探求并毫厘不爽地揭示海权的分量，则要困难得多。可是，如果不开展这项工作，那么人们对海权总体重要性的认知不仅模糊不清、空洞乏物，而且缺乏基础。这个基础应当是汇集具体的事例并通过对特定时期的情况分析，准确地把握海权的影响。

轻视海权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这种倾向的一个奇特的例证可以从英国两位作者身上看到，而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应该将其强大归功于海洋。阿诺德在其《罗马历史》中说，“曾两次发生过至高无上的天才人物挑战一个大国的资源与体制的事例，两次都以大国的胜利而告终。汉尼拔连续17年挑战罗马，拿破仑连续16年挑战英国；第一次挑战在扎马终结，第二次挑战在滑铁卢终结。”爱德华·克里西爵士在引述这段话时，补充道，“但是，这两次战争的相似之处有一点很少被充分阐述。那就是，最终击败了伟大的迦太基人的罗马将军与最终给予法兰西皇帝致命一击的英国将军之间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西庇阿和威灵顿多年来都大权在握，但是他们都远离主要战场。他们每人都将相同的国家作为自己军事生涯中主要的舞台。在西班牙，西庇阿就像威灵顿那样，接连不断地遭遇并挫败敌军主将手下几乎全部的将领，直至与被称为征服者的主帅本人对阵。西庇阿和威灵顿

在他们的同胞们因遭遇了一系列挫折而信心不足之时，使他们重树战斗信心。两人都摧枯拉朽般地彻底打败了敌人精心挑选的将领和精心挑选的久经沙场的士兵，从而结束了漫长且危险的战争”。

这两个英国人没有提到，在这两个事例中更引人注目的巧合之处是，制海权与胜利者在一起。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迫使汉尼拔进行漫长且危险的行军，穿越高卢地区拖垮了超过半数的久经沙场的将士；也使得年老的西庇阿在从罗讷向西班牙调兵遣将时，能够亲自阻断汉尼拔的交通线，并率兵回师特雷比亚，与入侵者对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队人马经由水路往返于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既无袭扰也不困乏，而西班牙则是汉尼拔的大本营。而梅陶鲁斯决战的结局，终因弟弟无法从海上搬来救兵驰援，而只能靠穿越高卢的陆路，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的部队陷入罗马军队的重围。因此，在紧要关头，两支迦太基人的部队被横亘绵延的意大利所分隔，其中一支被罗马将军们联合消灭。

另一方面，海军史学家们几乎不太费心关注通史与他们各自专门领域之间的联系，通常将他们自己局限在对海上事件的简单罗列上。在这一方面，法国人比英国人要好一些。前者的才能和所经受的训练促使他们更仔细地探询那些具体结局的成因以及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

然而，就我所知，尚无一部著作研究我们在此专门探讨的问题，即评估海权对历史进程以及国家繁荣的影响。其他的历史学家们在论述战争、政治、各国的社会与经济情况等问题时，对海洋问题仅仅是顺带涉及，通常漠然视之。而本书则将海洋利益置于显著位置，并且在不割裂它们与通史中所叙述的因果背景的前提下，试图揭示它们如何改变历史并被历史所改变。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始于1660年，当时独树一帜的帆船时代已经轰轰烈烈地到来；止于1783年，美国革命结束。虽然贯穿着接连不断的海上事件的历史主线被有意弱化，但是笔者还是着力呈现一个清晰且准确的概貌。作为一名对自己的职业满腔热情的海军军官，笔者著述时随心所欲地自由徜徉于海军政策、战略以及战术等问题间。但是，由于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所以在介绍这些问题时，语言上浅显易懂，希望以此引起非专业读者的兴趣。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1889年12月

总 目 次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年） (1)

亚洲问题 (451)

目 次

绪论	(1)
第一章	(19)
海权的构成要素	
第二章	(66)
1660 年的欧洲形势 第二次英荷战争 (1665—1667 年) 洛斯托夫特海战和四天海战	
第三章	(107)
英法联盟对荷兰联合省之战 (1672—1674 年) 法国反对欧洲联盟之战 (1674—1678 年) 索莱湾海战、特塞尔岛海战和斯特龙博利海战	
第四章	(136)
英国革命 1688—1697 年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比奇角海战和拉乌格海战	
第五章	(156)
1702—1731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马拉加海战	
第六章	(178)
法国摄政时期 西班牙大臣阿尔伯罗尼 英国沃波尔和法国弗勒里的政策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英国在西班牙控制的美洲的非法贸易 大不列颠与西班牙的战争 (1715—1739 年)	

第七章	(193)
1739年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 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4年法国西班牙联合抗击大不列颠 马修斯、安森和霍克进行的海战 1748年的《亚琛和约》	
第八章	(215)
1756—1763七年战争 英国的强势及其在各海洋、北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的征服地—系列海战：宾在梅诺卡外海之海战，霍克与孔夫朗之海战，波科克与德·阿赫在东印度群岛之海战	
第九章	(251)
从巴黎和约到1778年的事态发展 美国独立战争引发的海战 韦桑岛外海之海战	
第十章	(273)
1778—1781年在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发生的海战 该海战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 舰队在格林纳达、多米尼加和切萨皮克湾外海的作战行动	
第十一章	(310)
1779—1782年欧洲海战	
第十二章	(324)
1778—1781年间发生在东印度群岛的若干事件 1781年叙弗朗从布雷斯特港起航 1782和1783年叙弗朗在印度海域的辉煌海战	
第十三章	(368)
英军在约克敦投降后西印度群岛发生的事件——德·格拉斯和胡德的遭遇战 桑特海峡海战（1781—1782年）	
第十四章	(400)
对1778年海战的批判性讨论	
索引	(428)

绪 论

1

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争斗、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争的暴力行径，尽管它绝不是唯一的见证。远在左右海上贸易发展与繁荣的根本原则被明察之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海上贸易对国家财富与实力所具有的深远影响。为了确保自己的人民能够较多地分享这样的利益，人们想方设法地排斥异己，要么通过和平立法的方式制定垄断或对他入明令禁止的条款，要么当上述手段不起作用时，直接诉诸武力。利益的冲突，以及因在商业利益方面和在遥远的悬而未决的商业区域分割方面，如果不能占有全部份额也要占有更大份额的企图相互抵触而引发的愤懑，导致了战争。另一方面，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战争在战争行为与结局上，都因对海洋的控制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海权史以其宽阔的外延囊括了一切有助于让一个民族在海上或靠海洋而崛起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部军事史；而这一点如果不能称为本书后续章节唯一探讨的内容的话，也将成为各章节的重点。

对诸如此类既往军事史的研究必然涉及许多伟大的军事家们，以便获得正确的思想并在未来战争中灵活运用。在拿破仑这位志存高远的斗士所研究的战役中，他列举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所指挥的战役，火药当时还不为这些人所知。专业研究人员们一致认为：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随着时代的不同、武器的发展而产生变化，但是历史学上某些永恒的并因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教义能够升华为普遍原理。同理，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学的进步带来了海军武器的巨变以及蒸汽开始作为动力，但是对以往海洋史的研究所阐明的海战的普遍原理仍具有教育意义。

2

因此借鉴帆船时代海战的经验与历史具有双重的必要性，这是因为人

们将会发现这些研究为当今的应用与价值提供经验教训，同时以蒸汽为动力的海军迄今为止尚无可圈可点的教义。在前一个方面我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知识，而在后一个方面基本上一无所知。因此，未来海战理论几乎全为假说。尽管试图通过仔细研究汽船组成的舰队与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那些靠桨推进的桨帆战船组成的舰队之间的相似之处，为这些假说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样的类比相当地牵强，除非已经经受了彻底的验证。表面上的相似的确还远远不够。汽船与桨帆战船的共同特性是它们不依赖于风力，能向任何方向航行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从根本上将它们与帆船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在起风时只能在有限的几条航线上航行，并且在风停时根本无法航行。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是聪明的，而探求事物的不同之处也同样是睿智的。当人们的思想专注于探求相似性时，这也是人们最愿意做的一种探索，人们往往无法容忍新发现的相似物之间的任何差别，并因此可能忽略它们或拒不承认。因而，尽管桨帆战船与汽船所具有的上述重要的共同点在程度上不尽相同，但是它们至少有两处不同之处。当人们试图从桨帆战船的历史中总结出适用于作战汽船的经验教训时，必须时刻关注两者的不同之处与相同之处，否则就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桨帆战船航行时，其动力不可避免地迅速下降，这是因为人的体力无法长时间地保持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因此战术机动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无法持久^①。再者，在桨帆战船时代，攻击性武器不仅射程短，而且几乎全部仅限于肉搏战。这样两种情况几乎必然导致双方扑向对方，短兵相接，而不是机智地迂回或突然掉转方向，然后再近身对抗。在这样一种迅猛而混乱的战斗中，现今海军多数甚或绝大多数认同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海军武器产生的必然性——战史表明，上述混战如同置身于多尼布鲁克集市一样，难辨敌我。无论这一观点价值如何，都无法成为历史依据，因为一个独特的事实是：无论桨帆战船与汽船有什么样的不同，它们都能够在任何时刻直接袭击敌人，重创敌舰首。然而，这一观点只是一个假设，在战争的验证使之更为明了之前无法得到最终的判定。在此之前，相反的观点则拥有一席之地，

^① 于是，叙拉古的赫莫克拉蒂斯提倡要勇敢地迎击雅典人，以此来挫败雅典远征军对其城市的入侵（公元前413年），并始终保持在前进路线的侧翼。他说，“由于他们一定缓慢挺进，因此我们有一千个机会攻击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便于行动对船只轻装上阵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举进犯，那么他们一定奋力划桨，而当他们精疲力竭时，我们可以向他们发起进攻。”

即在数量相同的舰艇毫无章法的混战中，战法已无意义，这样的混战已经不是当今武器精良威猛时代的最佳选择。一个将领越是自信，其舰队战术研究得越细致，麾下的船长们越是技高一筹，也就越不情愿卷入一场舰船数量相同的混战。在那样的混战中，上述所有优势都不再起作用，机遇则决定一切，他的舰队的命运取决于所集结的舰船是否数量相同，而这些舰船在此之前从未一起协同作战^①。历史的经验昭示何时适宜这样的混战，何时不适宜这样的混战。

桨帆战船与汽船之间有一个突出的相同点，但在其他重要的特征方面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之处并非立刻显现，因而不被重视。相反，在帆船时代，引人注目之处则是它与更为先进的船只之间的差别。尽管也有相同之处且易于发现，但不如差别那样明显，因而人们的关注度也稍逊一筹。与汽船相比，帆船更依赖于风力，这一明显的弱点使得这一印象进一步强化。不考虑这一点的话，以往数量相同的舰船间进行的战斗，其战术经验仍旧有价值。桨帆战船从未因风平浪静而变得举步维艰，因而在当今比帆船更为人们所看重。但是，后者曾取代过前者，并一直独领风骚，直至汽船的出现。从遥远的距离给敌人以打击，在不受限制的时限内进行机动而不再令船员精疲力竭，更多的船员从划桨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拿起武器，这些是帆船和汽船所共有的。如果从战术角度看，其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桨帆战船能在无风或逆风状态下航行的能力。

在探求相似处时，人们不仅易于忽略不同处，而且易于夸大相同处，容易受到主观臆想的影响。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认为，由于帆船配备了远程炮，穿透力较强，并且安装了臼炮，射程较短，杀伤力极强，因此现代汽船配备了远程排炮和多管鱼雷发射组，后者只在有限距离内发挥作用，以凶猛的火力克敌，而舰炮依旧用于穿透敌舰。但是，这些只是典型的战术考量，一定会影响到将领们和舰长们的计划。这样的类比是真实的，并不牵强。类似的情况还有，帆船与汽船也都试图与敌船直接短兵相接——前者登船擒敌，后者撞沉敌船。对它们来说，没有比这更为困难

^① 看起来作者似乎在提倡煞费苦心的战术机动，以此进行毫无意义的武力炫耀，对此作者一定会为自己辩解。他深信一支想要获得决战决胜结果的舰队必须靠近敌人，但是必须是在已经获得短兵相接时的某些优势之后进行。这种优势通常通过机动，被最为训练有素、管理有方的舰队获得。事实上，仓促上阵的短兵相接以及极为胆小且战术上乏善可陈，其结果都常常是徒劳无益。

的任务了。为此，舰船必须行驶到战场的特定地点，而弹道武器则可以在一个开阔区域多点发挥作用。

考虑到风向的因素，两艘帆船或两个舰队的相对位置是最重要的战术问题，并且或许是那个时代水兵所主要关注的问题。乍一看，似乎这是件与汽船毫不相干的事，目前尚未发现两者有可类比之处，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也没有价值。但如果更深入地思考下风位与上风位的突出的特点^①，直接考虑它们的本质特点而不是退居其次的细枝末节，将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观点。上风位的显著特点是它拥有随机开战或拒战的权力，这又促使在选择进攻方式时，要利用进攻一方中常拥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也带有一些缺点，诸如战斗队形的随机性，暴露于纵向炮火扫射之下，丧失自身部分或全部的进攻火力——所有这些在向敌逼近的过程中发生。处于下风位的船只或舰队无法进攻，如果它不想撤退，那么它仅限于防卫，被迫招架应战。相对容易地保持战斗队形不被扰乱，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以连续的炮火压制敌人，使这一劣势得以弥补。从历史上看，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在所有年代的进攻与防御作战中都有体现或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为了接近并消灭敌人，进攻方冒有一定的风险并需克服一些不利因素；而防御方只要一直保持防御的态势，就能够规避因部队推进而产生的危险，保持一个深思熟虑并行之有序的阵形，并利用进攻者暴露于己而获得优势。透过上风位与下风位之间细枝末节的迷雾，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两者之间本质的不同，英国人一般情况下选择上风位，因为他们一贯的政策是打击和消灭敌人；而法国人追求下风位，因为他们常常以此能够在敌人迫近时重创敌人，从而避免决一雌雄的遭遇战，并保存战船。法国人几乎千篇一律地将海军的行动从属于其他军事部署，对其所需军费十分吝惜，因而寻求通过采取防御的策略并以有限的反击来更经济地使用他们的舰队。由于这一缘故，只要遇到虚张声势的敌人时，就可以出色地采用娴熟的下风位。但是当罗德尼表现出不仅在进攻时，而且在敌占线的某处进行大规模集结时也想要利用风向优势时，其精明的对手吉尚则改变了战术。在三次战斗中，第一仗

^① 船有居上风位置一说，或称为“风向优势”，或“航行到上风”，此时风向使得该船能够驶向对手，而对手无法迎头阻击。极端的例子就是风从一方直接吹向另一方。但是，双方在“占据上风”的具体运用上都有很大的余地。如果处于下风的船作为一个圆的圆点，那么在约八分之三的区域里，对方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并保持风向优势。下风位是上风位的反义词。

法国人利用了下风位；但是在识破罗德尼的图谋之后，他机动到上风位，不是为了打仗，而是实施规避，除非对己方有利时才交战。但是主动进攻或规避交战的决定权不再取决于风向，而是取决于哪一方速度更快。而速度在舰队中不仅取决于单艘船只的速度，还取决于作战时战船间战术上步调一致。在那之后，速度最快的舰船则占据上风位。

因此，从帆船以及桨帆战船的历史中探求有益的经验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毫无结果的空想。它们各自都与现代舰船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一些本质的不同。这也使得照搬它们的经验或作战模式作为可沿用的战例是不可取的。但是一个战例不同于一条原则，也不像原则那么有价值。前者可能原本就是错误的，或者可能因环境的变化不再适用；后者则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中，并且无论其应用如何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它始终是获得胜利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战争蕴含着这样的原则，通过研究过去探寻出它们的踪迹，在一个个胜利与失败中闪现出历经时代变换而颠扑不破的那些原则。条件与武器发生了变化，但是为了应付这类变化或成功地运用那类变化，必须尊重这些颠扑不破的历史准则，它们有的关于战场战术，有的是属于战略名下的更大范围的战争作战。

然而，这些规模更大的作战涉及全部战场时，或者当海上争霸在全球大范围内爆发时，这些历史准则更加具有不言而喻且持久不变的价值，因为它们产生的条件更为经久不变。战场或大或小，困难或多或少，参战部队或强或弱，调兵遣将或难或易，但这些仅仅是规模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随着野蛮让位于文明，交通手段倍增，开路架桥，给养来源更广，作战变得更为容易、更为迅捷，战场更为广阔。但是它们必须遵循的原则依然如故。当徒步行军被马车运送替代，而后者让位于铁路投送，作战距离在增加，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所需时间在缩短。但是，那些原则没有改变，它们决定着部队集结的地点、机动的方向、敌阵地应被攻击的位置、交通线的保护等。因此，在海上，由桨帆战船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港口悄悄航行至另一个港口，发展到帆船向地球的尽头大张旗鼓地扬帆远航，再由帆船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汽船，这样的演变扩大了海战的范围，加快了海战的速度，而并未不可避免地改变那些指导原则。前引的2300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演讲包含了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其原则既适用于当时，也适用于现今。当势不两立的军队或舰队接触（与其他词相比，

8